

From Jiangnan to the Entire Realm: A Temporal and Spatial Examination of the Change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Ruilai WANG

Abstract: The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outhern Song to the Yuan dynasty, unlike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towards the early modern era, marks a significant shift guiding traditional China towards modernity. Founded in Jiangnan, the Southern Song integrate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res, fostering a thriving market economy and strong regional societies, while also accelera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areer choices among intellectuals. On this foundation, dynastic changes ensued. Conquests, largely bloodless, preserved the millennia-ol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of Jiangnan, allowing it to flourish further under unified governance. The fusion of Jiangnan's culture with northern influences gave rise to novel elements within Chinese culture.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ong to the Yuan dynasty unfolded comprehensively,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e Yuan dynasty, often overlooked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by academia, represents a pivotal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deserving special attention. Examining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from the Southern Song to the Yuan dynasty provides insights into China's trajectory towards modernity.

Keywords: Southern Song, Jiangnan, Yuan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Local gentry, Song-Yuan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Author: Ruilai WANG received his BA degre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PhD from Gakushuin University, Japan, in 2002. Currently, he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s, Gakushuin University, Japan, and Chair Professor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His research field covers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He is the author of thirty monographs including *Song zaifu biannian lu jiaobu* [Philological Revision of Song zaifu biannian lu], *Sōdai no kōtei kenryoku to shitai fu seiji* [The Power of Emperor and the Power of Literary Class in Song China] and so on. He is also the author of nearly 300 journal articles.



從江南到全域

——宋元變革的時空考察^①

王瑞來

[摘要] 開啟于南宋的宋元社會轉型，跟走向近世的唐宋變革不同，這是引導傳統中國走向近代的重大轉型。立國於江南的南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重心合一，商品經濟繁榮，地域社會強盛，士人流向多元化勢頭加速。在這樣的社會積澱之上，江山鼎革。基本不流血的征服，讓千年繁盛的江南經濟結構與生產力沒有遭受重創，反而在大一統的局面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江南的文化也與北方因素融匯，構成新的中國元素。宋元變革在元代全面鋪開，奠定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基礎。歷來被學界有意無意漠視的元代，作為中國歷史重要的轉折時期，值得特別關注。考察從南宋到元代特定的歷史時空，可以從中尋覓和思考近代中國的來路。

[關鍵詞] 南宋 江南 元代 士人 鄉紳 宋元變革

[作者簡介] 王瑞來，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2002年獲日本學習院大學史學博士，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四川大學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史與文獻學。單獨出版有『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宋代の皇帝權力と士大夫政治』『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士人走向民間——宋元變革与社会转型』等中日文學術著作與古籍整理著作31種，學術論文300餘篇。

① 關於宋元變革論的思考，曾在日本的華人學術團體「以文會」做過兩次報告，從評議人以及與會學友的評議中獲益良多。此次刊出，又汲取了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責任編輯的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前言

繼唐宋變革之後，宋元變革社會轉型，開啟於南宋。南宋立國江南，擁有特殊的時空。江南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發展成為經濟重心，其後大一統王朝的隋、唐、北宋，政治重心都處於中原，政治與經濟重心處於二元分離狀態。南宋猶如南朝的再現，讓政治、經濟乃至文化重心再度合一。在北宋，科舉規模擴大形成士大夫政治，與此同時造成大量士人層，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交織，經濟發展的自由化程度也較前代大幅增加。擁有這樣唐宋變革的綜合積澱，在新的歷史時空之下，特殊的促因，讓宋元變革水到渠成般地自然開啟。這一長時段的社會轉型，始於南宋，貫穿元代，變革的成熟期正是出現在非漢族統治的元代。

面對在特殊的歷史時空發生的社會變革，人們或許會有很多疑問。繼唐宋變革之後，新一輪宋元變革何以會首先發生在江南？變革有多少北方因素？在非漢族統治的元代，變革又呈現出什麼樣的形態？以下，在既有的宋元變革研究的基礎上，^①我的考察將從作為時空定位中的江南南宋出發，考察特定時空中士人的活動，進而將歷史時空推移到元代。對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時代，重點考察社會轉型全面鋪開的具體樣態。

一 時空定位：變革開啟於江南的南宋

遭逢特殊的國際形勢，人文地理的位移，讓南宋與江南重合。中國大陸儘管幅員遼闊，但重心存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長時段歷史理論的立足點，是地理環境決定歷史演進。自魏晉南北朝以來，江南這一千年的繁華地，南宋為其打上新的印記。從此，最具中國元素的江南，開始成為中國的代表。對此，錢穆先生曾扼要地指出：“唐以前中國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後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則轉移到南方了。”^②我們觀察著名的“胡煥庸線”（瓊瑋—騰沖線）地圖，線東南是降雨量豐沛的農耕地域。這裡佔中國國土面積的43.8%，卻生活著94.1%的人口。廣域的江南則是線東南的重心所在，降雨量最為豐沛，人口最為密集。密集的人口，精耕的農業，發達的經濟，生長出繁榮的文化，無疑也最具代表性。

江南的現成存在，自然成為我的關注重點。那麼，南宋以外的北方和中原的金朝統治區域以及其他江南以外的地域可以被忽略掉嗎？導入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區劃分理論範式，應當可以規避地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所帶來的考察困難。地域發展既不平衡又漸進趨平，既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繫。就像一池湖水，儘管水溫水深會有不同，但同處一池，自然會有交互影響。藉由元明統一的時勢，從轄域並不遼闊的南宋江南時空發端的變革，如同長江、黃河東流入海，水流從高就低，歷史發展的主流彙集支流，經濟、文化乃至政治的推手，便逐漸先後將變革輻射擴展到大陸的各個地域。關注江南，並非局限於區域史，而是從江南提取面向全域的普遍意義。

歷史的發展總是呈現出相似性。不僅南宋猶如南朝，元取代宋，也像是北朝隋滅南朝陳，實現長期分裂後再度統一。所謂相似性，不僅體現出表面形態的相似，其實也反映了歷史演進內在邏輯的共同性。的確，是北朝隋實現了南北統一，但從隋到唐的社會形態，卻處處呈現出南朝化

① 關於宋元變革，筆者已有不少闡述。論文有「科舉停廢的歷史：立足於元代的考察」，收入劉海峰編『科舉制的終結與科舉學的興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155-166；「金榜題名後：“破白”與“合尖”——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一」，『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3（2009）：80-90；「寫意黃公望——由宋入元：一個人折射的大時代」，『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4（2011）：57-68；「內舉不避親——以楊萬里為個案的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2012）：117-128；「小官僚大投射：羅大經仕履考析——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三」，『文史哲』1（2014）：104-117；「士人流向與社會轉型——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四」，『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2014）：107-118；「從近世走向近代——宋元變革論述要」，『史學集刊』4（2015）：70-83；「追尋中國走入近代的軌跡」，『文彙報』2016-12-30；「向下看歷史：宋元變革論略說」，『思想戰線』6（2017）61-65。著作有：『近世中國——從唐宋變革到宋元變革』（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士人走向民間：宋元變革與社會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

②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第120頁。

的勢態。^①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處於中原和北方的五胡十六國之中，不少政權就奉地處江南的東晉年號。這是文化的先進帶來的正統。^②

從歷史的大視野觀察，政治的力量往往敵不過文化的力量。宋元易代也是同然。元朝在政治制度上儘管對南宋吸收較少，但在廣闊的南宋舊疆域，經濟制度與地方行政，出於管理的實際需要，沿襲南宋之處相當多。統一後人口眾多、經濟繁榮與文化發達的江南，其社會因素畢竟對全域產生了有形或無形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跨越為期並不長的元代，融合華北乃至廣泛的北方從唐末以來多民族混居的社會狀況，與明清實現了直接對接。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過廣義的塞北江南化的趨勢。到北魏洛陽訪問的南朝梁武帝的使者陳慶之，原以為長江以北都是野蠻的戎狄之鄉，親眼目睹之後，感慨地說：“衣冠士族，並在中原。”^③南北文化的接近，是隋唐實現統一的內在因素。歷史上第二次塞北江南化的趨勢，則是出現在元朝的全域統一。表面上看，元統一全域是軍事力量的結果。其實，仔細梳理遼、金治下的中原北方充分漢化歷程，則可以觀察到，南北趨同的文化接近是更為重要的因素。沒有這樣的文化接近，包括道學在內，朝野對江南文化的全面自主接受，就不可能在元統一後出現。當然，接受也並非是單向性的江南接受，而是充分融合北方因素的結合。

其實，江南從來不是悄然獨自繁華，僅僅依賴自身因素成為經濟、文化重心的。南朝的政治、經濟重心的首次合一，來自中原的政治力施加的作用就十分顯著。而南宋再度的政經合一，依然是來自中原的政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把南朝以來江南經濟重心化做了最後有力地一推，讓江南經濟重心的地位從此確固不移到如今。靖康之變，造成了繼西晉“永嘉南渡”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④“時中原士大夫避亂者多在嶺南”。^⑤避亂移民除了大量官僚士大夫知識精英，還包括有大量平民。這不僅把中原的文化以人的流徙方式融入到了江南，人口的激增，也增多了江南的勞動力。南宋中期的人口數已達六千多萬人，超過了漢唐時期的最多人口數。^⑥從經濟史的視點觀察，自秦漢以來，國家財政一直以農業稅為主。但從北宋開始，專賣、商稅等工商業收入便超過了農業稅，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⑦這一事實，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北宋積澱的基礎上，政治經濟重心合一的南宋進一步加速了生產資源私有化、私有產權安定化的進程，形成經濟資源的大規模市場化流通，促進了新型生產技術的開發與普及，使生產力與物質生活水準大幅提升。適應經濟活動市場化、城鎮化趨勢，從北宋開始，朝廷便逐漸改變了傳統的以土地稅為主的直接稅收模式，而採取以商業稅為主的靈活的間接稅收模式。在維護私有財產的前提下，保障了國家的財源。^⑧比如南宋的酒稅和海外貿易，就成為軍費耗資巨大的重要財政來源。無需特別橫徵暴斂，南宋朝廷總是可以基本通過經濟手段來保障或急或緩的軍政支出。由此可以觀察到，經濟運行與宋元社會轉型直接相關。

二 時空中人：士人流向與社會轉型

士人的命運，這個切入點跟我一直進行的士大夫政治研究互相銜接，不過向度不同。我的士

① 關於隋唐的南朝化趨勢，即隋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發生了向南北朝時的南朝元素傾斜的趨勢。這一觀點最早由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提出（上海：商務印書館，2011，第156頁）。其後，唐長孺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對“南朝化”問題做了系統性的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第385頁）。

② 王瑞來：『中國史略』第五章第7節「再生への陣痛」（東京：DTP，2009），第191-199頁。

③ 〔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周祖謨校釋，第93頁。

④ 〔宋〕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蕭魯陽點校，第36頁。

⑤ 〔宋〕李心傳：『繫年要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辛更儒點校，第1114頁。

⑥ 〔宋〕王應麟：『玉海』卷二〇「戶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1986）第943冊，第508頁。

⑦ 黃純豔：『宋代財政史』（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13），第7頁。

⑧ 參見Guanglin Liu, “The Making of a Fiscal State in Song China”, *68Econ.Hist.Reu.* 48(2015).

大夫政治研究，以與皇權相關聯的中央政治為主，那是眼光向上的研究。^①而宋元變革論由士人的命運切入，則是眼光向下的研究，關注士人以及士大夫所在的地域社會。

儘管科舉在北宋的規模擴大給無數士人帶來了無限憧憬，由科舉而改變命運的貧困之士也為數不少，但由科舉入仕，一直是一條異常艱難之路。以概率言之，宋代科舉解試百人取一，省試十人取一，也就是說錄取倍率在千分之一。這樣的競爭高倍率，在現代社會的各種資格考試中也是少有的。從存世史料看，這種嚴峻狀況從北宋到南宋一直存在。^②南宋進士登第者約有5萬人，在這5萬人的背後，名落孫山的，可以說有著5千萬人次。艱難的科舉之途，讓大量士人望而生畏。像『儒林外史』描寫的范進那樣鍥而不捨的士人固然有，但落第後轉向和壓根就不事舉業的士人則更多。他們流向社會，以各種職業謀生。

為數五萬的命運寵兒，經過激烈角逐，鯉魚跳龍門。一般人的想像，金榜題名後，便是肥馬輕裘，鐘鳴鼎食，高官厚祿。各種文獻記錄的，也多是呈現出這樣光明的一面。這樣白字黑字言之鑿鑿的記錄，既誘惑了當世人，也蒙蔽了後世人。

科舉這架官僚再生產的機器，源源不斷地向官場輸送官員。然而任何王朝都面臨的實際問題是，容納不下過多的管理人員。在已有冗官之歎的北宋，便嚴格設置了選人這樣的制度限制。科舉登第以及以其他途徑入官的，首先成為選人，擔任州縣等處屬官一類的低級官僚。按制度規定，要在選人七階之內一年一年循資升遷。而從選人七階突圍，成為中級官僚的京官，則極為困難。除了自己的政績之外，還要有五個官員的推薦信。五個推薦人當中，又必須有兩人是直屬上司。

不像“一切以程文為去留”^③的科舉，選人升遷至京官，命運已經無法自己掌控。每年出官名額有限，奇物可居，推薦充滿利益交換、金錢賄賂。大量無背景無勢力的選人，無法掙脫被稱為“選海”的七階之限，只能終生擔任俸祿微薄、地位低下的低級官僚。^④科舉登第者改官難、升遷難，可以說是科舉與生俱來如影隨形的贅疣。這一問題到了科舉規模擴大化的北宋開始變得嚴峻，進入南宋，選人改官更較北宋為難，愈發成為無法解決的死結。頭懸梁，錐刺股，甚至傾全家族財力而換來了金榜題名，前途卻一片黯淡。由失望而致絕望，轉向他途，或者不再讓子孫圓夢科舉的士人比比皆是。我寫過幾篇宋元變革論的實證研究，其中講述的個案歷歷可見。^⑤

不走仕途走他途，他途同樣充滿魅力，追求功名不再是唯一的選項。南宋地處江南，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士人可以從事的職業很多。有些人讀書學習接受教育，原本就沒指望去走可望難及的科舉獨木橋，而就是想獲得從事吏職的本事。這種傾向自北宋而然，至南宋而愈盛。蘇轍說吳、蜀等地“家習書算，故小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為之”。^⑥李新也指出，有的人送子弟去州縣學校讀書，目的就是為了將來“與門戶充縣官役”。^⑦我的「士人流向與社會轉型——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四」一文，便從南宋的史料中爬梳出的士人經營田產例、士人剃髮出家例、士人教書例、士人經商例、士人為吏例等，士人流向形成多元化。^⑧就是說，從具體的個體生命經驗出發，來觀察士人階層的社會化趨勢。這樣以小見大的操作，應當說更具感受

① 王瑞來：『宋代之皇帝權力と士大夫政治』（東京：汲古書院，2001）。

②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一一三『論逐路取人劄子』：“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北京：中華書局，2001）李逸安點校，第1717頁；〔宋〕周必大：『周必大集』卷一四一『論解試試官』：“以一州言之，三千人就試，共解三十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王瑞來校證，第2170頁。

③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李劍雄、劉德權點校，第69頁。

④ 王瑞來：「金榜題名後：“破白”與“合尖”——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一」，『國際社會科學』3（2009）：80-90。

⑤ 參見王瑞來：「小官僚大投射：羅大經仕履考析——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三」，『文史哲』1（2014）：104-117；王瑞來：「科舉家族與地域網路——以曾安強與周必大為中心的個案解析」，『社會科學研究』3（2015）：1-4；王瑞來：「寫意黃公望——由宋入元：一個人折射的大時代」，『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4（2011）：57-68。

⑥ 〔宋〕蘇轍：『蘇轍集』卷四五「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北京：中華書局，1990）陳宏天、高秀芳點校，第792頁。

⑦ 〔宋〕李新：『跨龍集』卷二〇『上王提刑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1986）第1124冊，第563頁。

⑧ 王瑞來：「士人流向與社會轉型——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四」，『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2014）：107-118。

力與說服力。治域縮小，員多闕少，政經重心合一，商品經濟發達，平民文化水準提升，諸多因素匯成合力，加速士人流向走向多元化。

走出鄉里，成功步入仕途的中層以上的士大夫官僚，其實也沒有與地域社會脫離聯繫。由於一闕數人，任滿之後也往往需要有長達數年的待闕，方能赴任。並且出於丁憂服喪等原因，也要回到故鄉數年。而致仕後的士大夫，到去世為止，多數則一直生活在鄉里。這些滯留鄉里的士大夫，並不是閑著什麼也不幹，他們既經營家族的生計，更憑藉地位聲望，積極參與到地方社會之中，推動地方的社會事業。在他們的周圍，也聚集著一大批士人。根植於地方社會中的士大夫，正是明清地域社會鄉紳的源頭。

科舉入官取代了貴族世襲。宋代一定級別的官員子弟儘管享受恩蔭，不經科舉便可進入仕途，但其中的多數也只能停留在低層。為了家聲不墜，宋代士大夫注重家族經營，並且士大夫間盛行通婚，還吸納有為的士人為婿。從北宋開始，逐漸形成了以知識和財產為基礎的新士族。明清以來的族譜上向追溯，儘管會看到很多對遠古名人的攀附，但比較明確可信的就是宋代，特別是南宋。傅衣凌先生就指導他的學生說：“做鄉族研究要追根溯源，至少要追到宋代。”^①明清以來訖於近代，往往以家族姓氏命名村莊，其實正可以溯源至南宋以來的宗族發展。由此可以概見宋代士大夫家族建設的努力和成果。常建華寫道：“宋元明清宗族制度的總體特徵是通過祭祖及建祠堂、選族長、修族譜、設族田、建族學使之組織化，其歷史發展的趨勢是體現其民間社會的普及和自治化。”^②這便是從宗族制度的角度闡述了宋元明清地方社會的連續性，體現的正是宋元社會轉型的重要指標之一。

家族、宗族是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在地方社會的活動中，宗族往往又是主要參與單位。家族的興盛與家族間的聯姻，也讓血緣組織向地緣延申。超越血緣組織，更有普遍的地緣組織，地方社會結社盛行。行業有行會，鄉里也有各種互助組織，文人還有詩詞書畫的結社。地緣成為一種文化的血緣。修橋、鋪路、開渠、救荒，士大夫和士人是主要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例如在南宋曾經擔任過中層官僚知州的魏峴，從在外為官到退居鄉里，一直關注並參與家鄉的水利建設，改造修建了與鄭國渠、靈渠、都江堰合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的四明它山堰，還留下一部總結建築這一禦鹹蓄淡引水灌溉樞紐的『四明它山水利備覽』。^③

亦官亦民的士大夫、士人，是社會的中間力量，作為官與民的媒介，成為聯結國家與地域的紐帶。^④南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既有協調合作，也有利益上的緊張對立，在商品經濟的支撐下，顯現強勢。政治天平明顯由歷來的中央向地方傾斜。大量士人的參入，顯然提升了地方社會的知識層次。地方社會在知識精英的引領下轉型，明清時代的鄉紳社會毫無疑問正是發端於南宋。清代中後期，特別是乾隆和嘉慶、道光時期，朝廷鼓勵村落與宗族自治，^⑤儘管有出於朝廷緊縮財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的因素，但也不能不說是朝廷對延續宋元以來強勢鄉紳勢力的因勢利導。

唐末五代以來社會動亂改變了社會形態，世家大族衰微，貴賤界限含混，呈現平民化趨勢。入宋以後的科舉規模擴大更帶動了全社會向學，加速了文化下移，知識水準普遍提升。新興的平民知識精英活躍於地方，不僅成為士大夫政治的基礎，還成為社會的引領者。除了以進入仕途為目標的習舉業士人，為了日常生活不至困窘，經濟並不富裕的一般人家往往也通過各種方式，讓下一代接受初等教育，習學童蒙曆算。這種在北宋以來出現的社會現象，在南宋以後商品經濟發達的背景下更為普遍，一直延續到近代。

① 鄭振滿、鄭莉、梁勇：「新史料與新史學——鄭振滿教授訪談」，《學術月刊》4（2012）：155-160。

② 常建華：『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8頁。

③ 參見王瑞來：「它山攻錯——地方學者與鄉土歷史的古與今」，《澎湃新聞》2022-11-9。

④ [日]斯波義信：「南宋における『中間領域』社会の登場」，收錄於[日]佐竹靖彦編『宋元史学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6），第261-323頁。

⑤ 參見Taisu Zhang, *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Kinship and Property Pre-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 ch.5sec.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南宋人王象之在『輿地紀勝』中援引『延平志』記載福建南劍州的情形云：“家樂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誦暮絃，洋洋盈耳。”^①似乎有些誇張的描述，我們從耐德翁『都城紀勝』記載南宋臨安內外的教育盛況也可以得到印證：“都城內外自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②教書育人的鄉先生職業，也為活躍於地域社會多數士人提供了生存空間。

社會需求造成的文化下移，也讓擁有知識的讀書人在地方社會受到普遍尊重，被賦予了政治權勢與經濟財富這樣富貴以外的特殊的社會地位。文化優勢成為一種適足與政治權勢與經濟財富相抗衡的力量。而三者的結合，則形成了地方社會的主導勢力，這便是迄止於近代一直活躍在地方社會的鄉紳勢力。

江南作為道學的發源地和社會轉型的樣板田，建立在地域社會的強盛和經濟繁榮的基礎之上。原本作為士大夫政治理論基礎的理學，經歷南宋慶元黨禁的壓力，逆反昌大為道學。道學不僅為失去中原的王朝提供了申說正統的依據，成為弱勢國家的精神支撐，還讓士大夫成為了道統承載者的社會精神領袖。士人主導下的鄉賢祭祀，也讓宗教走向泛化、世俗化，地方廟宇的香火興盛。歸鄉的士大夫借助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和人際網路關係，向朝廷為地方爭取利益，如書院興建與祠廟賜額等。這樣的行為本身與效果彰顯，又反過來鞏固和強化了歸鄉士大夫的地方領袖地位。在理宗朝以後，中央與地方形成合力，共同推動道學，而在鄉士大夫主持的書院則成為道學發展的重要陣地。通過地方勢力，道學在地方深深紮根。

知識人社會角色的轉變，推動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轉型。向通俗而世俗方向發展的社會文化，精英意識淡薄，疏離政治，貼近民眾。平民文化的主要承載者便是紮根在地域社會的士人。據統計，活躍於南宋中後期的江湖派詩人中，下層士大夫和布衣士人佔據的比例高達88%。^③王水照就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南宋最著名的文學家大多在宋寧宗開禧年間（1205-12307）前後去世。”然後說道：“自此以後七十多年（幾佔南宋時期的一半）成為一個中小作家騰喧齊鳴而文學大家缺席的時代。文學成就的高度漸次低落，但其密度和廣度卻大幅度上升。”^④這一描述正反映了文化的普及。

元代雜劇的興盛，明代市民文化的繁榮，似乎都可以從南宋中後期的文化形態中窺見到形影。比如說，南宋戲文就構成了元明南戲的源頭。作為市民文藝的標誌性體裁的小說、戲曲在南宋時期成熟。聞一多指出：“中國文學史的路線南宋起便轉向了，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⑤俗文學的興盛則加速了道學教化的下行。元雜劇托古諷今所反映的忠義貞節觀念，也折射了道學在民間滲透的廣度。

最近的研究表明，10世紀以後，西域吐魯番盆地民族開發的蘆葦、稻殼等造紙技術傳入江南，使“木化”的竹子與稻殼等成為造紙的主要原料，大大降低了造紙成本。^⑥廉價的竹紙、稻殼紙大量生產與流通，成為印刷業大規模興起的物質基礎。因此，唐末五代出現的印刷術，伴隨著繁榮的江南經濟，在南宋得到空前的普及。原本起自民間的印刷術，經歷了北宋的政府壟斷之後，在南宋又重新“飛入尋常百姓家”，官私、書院刊刻之外，書坊蜂起，書籍走入流通領域，遠販各地，乃至海外。

印刷業的興盛，可謂是繼紙張普及之後的又一次新媒體革命。提高了識字率，加速了文化下

①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三三『南劍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趙一生點校，第3006頁。

② [宋]耐德翁：『都城紀勝』（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湯勤福整理，第19-20頁。

③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附錄一「江湖詩派成員考」（北京：中華書局，1995），第271-317頁。

④ 王水照：『南宋文學的時代特點與歷史定位』，『文學遺產』1（2010）：47-55。

⑤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1冊『文學的歷史動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第201頁。

⑥ [日]江南和幸：「コディコロジーと紙の科学的分析学との邂逅：科学的コディコロジーの提案」シンポジウム「紙のレンズから見た古典籍—高精細デジタルマイクロスコープの世界—」（予稿集）（研讨会：『镜头下的纸所见的古籍——高度精密的数字化显微世界』资料集），https://www.jissen.ac.jp/bungei/event/r28lrh0000003hpb-att/2021symposiumShiryu_2.pdf。

移。儒釋道經典、科舉時文、詩詞文集、戲曲話本、白話小說、童蒙曆算，印刷書籍溝通精英凡庶。南宋的陸游『秋日郊居』中的一首這樣寫道：“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其下陸游自注云：“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①這裡提及的村書『雜字』『百家姓』之類就是流行於民間的印刷品。史籍『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也記載說：“江西州縣百姓好訟，教兒童之言，有如『四言雜字』之類。”^②

印刷業的繁榮，既活躍並普及了文化，也成為士人交往的重要工具。於是，道學賦予的共同理念，書籍的傳播與士人的流徙，便超越時空，不僅將看似孤立的地域連成一體，還將知識普及開來和傳承下去。內藤湖南指出：“印刷技術的發展對弘揚文化是個巨大推動，隨之出現了學問的平民化傾向。”^③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轉型，發達的印刷業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南宋士人走向民間的歷史現象，也較早地進入到歐美學者的視野。宋代是士人們的關心由中央轉向地域的時期，這是韓明士的基本認識。從他書中所使用的大量事例可知，韓明士筆下的宋代主要是南宋。^④這種認識，包弼德也有來自思想史視野的相近觀察。^⑤可以這樣簡單地歸納，北宋士人的關懷主要是全國性的，南宋士人的關懷則發生了地方性的轉化。跟唐代乃至北宋相比，南宋更為顯現出政治與社會離散的趨勢。

三 時空推移：轉型在元代全面鋪開

在學界，無論是“兩宋之際轉型”說，還是“宋、元、明過渡”說，都對元代這一時段形成了無意中的漠視。元代呈現的一些表面現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定勢思維，遮蔽了未經深入考察的研究視野，尤其缺少由宋入元的貫通研究。其實，觀察中國歷史走向近代的歷程，元代是極為重要的關節點。

（一）追尋來處：元朝的沿襲與發展

元朝的政治制度除了保留有蒙古舊制之外，對原宗主國金朝的因素吸收較多。那麼，金朝是一個什麼樣的王朝呢？實際統治北中國的女真人，在百餘年間，又承繼原宗主國遼朝契丹人的傳統，在接受中原文化方面走得相當遠。『金史·百官志』就像是說金朝的制度：“大率皆循遼、宋之舊”。^⑥『金史·選舉志』更是明確記載：“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⑦金世宗在告誡皇太子和各個王子時便指出過這樣的現象：“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在另一個場合，金世宗還指出：“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⑧從皇室之一斑可以概見金朝治下的全社會漢化程度。正是由於對中原文化的充分接受，讓金朝擁有了很大自信，乃至都要自稱“中國”，與中原王朝一爭正統。^⑨在科舉取士的刺激之下，產出了大量士人，幾乎成為適足以兩宋比肩的科舉社會，在地域社會也有著活躍的士人圈子。在北方地區，除了對周程理學的個別接受，更多的則是由於科舉詩賦的提倡，通過蘇軾、黃庭堅等著名詩文對儒學の間接接受。

① [宋]陸游：『劍南詩稿』卷二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第193頁。
 ②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九（北京：中華書局，2013）胡坤點校，第2825頁。
 ③ [日]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夏應元等譯，第389頁。
 ④ Rober P.Hymes, *Statesmen and Genr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⑤ Peter K.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⑥ [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216頁。
 ⑦ [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130頁。
 ⑧ [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57、159頁。
 ⑨ 熊鳴琴：『金人‘中國’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90頁。

蒙古又通過金朝間接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中原文化。統一前的蒙古部落首領便曾模仿中原王朝，自稱“祖元皇帝”，建元“天興”。到窩闊台時期，已由孔子後裔孔元措主持取代成吉思汗時使用的西夏樂，將漢文化的舊金禮樂用於蒙古朝廷。^①並召名儒“直釋九經，進講東宮”。^②忽必烈從儒學經典『易經』擇取“大哉乾元”，立國號為“元”，建元“中統”。這一時期，甚至刊行了由蒙古文字、維吾爾文字翻譯的『資治通鑒』。^③進入漢地的蒙古帝國，終於成為立足于農耕地區漢族模式的元王朝。在語言上，“太子”等蒙古語發音與漢語的接近，也顯現出中原文化影響的痕跡。^④除了久遠的間接影響，由於江南的併入，加之統治佔全國人口82%江南的需要，元朝的制度吸收來自南宋的因素，就成為不可避免的自然之勢。

蒙古舊制，疊加遼金的傳承，融入南宋的制度，元朝最終呈現出的是多元一體的政治結構。不僅政治結構，經濟、文化也顯現出以漢族文化為主的多元一體形態。漢民族聖人孔子的地位越來越高，元成宗下詔說“孔子之道，垂憲萬世”，通令全國一律崇奉。^⑤到元武宗時期，孔子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⑥達到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法國的蒙古學家勒內·格魯塞這樣講道：“事實上，儘管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國，但他本人首先就已經被華夏文明所征服。”^⑦這是透過帝王對元朝的整體評價，表明了漢族文化在元朝佔據的主體地位。追尋這一時代的漢族文化，則主要是來自江南的南宋文化。

超越江南視角，近年來飯山知保、王錦萍等學者以歷史人類學視角，將目光轉向北方。透過田野考察，發掘實物史料，已有大量成果，為考察宋元變革提示了有益的北方經驗。^⑧包括遼金統治的中原，北方社會經過遼、金和金、元易代，其社會階層的形成以及文化表現，與南方多有差異，儒學也不能與道教、佛教競爭。這一事實必須承認。然而，北方社會儘管呈現出與江南經驗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但潛在的文化同質性，形成了最終統合的基礎。承繼這樣的基礎，元朝實現統一之後，蒙古人加上色目人不過全人口的百分之三，來自南中國強勢文化彌漫全域則是勢所必然。這也可以視為社會轉型在元代得以繼續發展的客觀因素。特別是宋蒙戰爭造成的人的流徙，在客觀上也帶來了文化的流動。1276年元軍進入南宋都城臨安，掠往大都的不僅是南宋的君臣，還有三學諸生。^⑨江南文化也跟隨著被迫遷徙的知識人一同北上。以江南為主，疆域割據消失的元代，不僅全面承續了南宋以來的社會變革，還將社會變革向全域緩緩鋪開，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逐漸實現具體落實。

（二）“看不見的手”：由經濟史視點切入考察

宋元易代，異族統治並非如想像中的黑暗。蒙古征服南宋，除了在一些激烈抵抗的地方實行殘暴屠城之外，大多是不流血征服。^⑩中國學者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也如此指出：“忽必烈滅亡南宋統一中國，在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歷代王朝更替重建統一帝國的戰爭中，是戰事最少，殺戮

① [明]宋濂：『元史』卷七二『郊祀志』載：“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上帝，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781頁。

② [明]宋濂：『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3459頁。

③ [明]宋濂：『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242頁。

④ 參見王瑞來：『中國史略』第八章「世界の中國」第1節「勃興前のモンゴルに対する文化的認識」（東京：DTP出版，2009），第451-455頁。

⑤ 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卷五『廟學』：“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欽奉聖旨：論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210頁。

⑥ [明]宋濂：『元史』卷二二『武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484頁。

⑦ 轉引自卜憲群總撰稿『中國通史（遼西夏金元）』（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第153頁。

⑧ [日]飯山知保，『金元時代の華北社会と科挙制度—もう一つの「士人層」』（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1）。Tomoyasu Iiyama, *Genealogy and Status: Hereditary Office Holding and Kinship in North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3). Jingping Wang, *In the Wake of the Mongols: The Making of a New Social Order in North China, 1200-16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⑨ [明]宋濂：『元史』卷九『世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180頁。

⑩ [日]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第23-25頁。

最少，破壞最小的一次。”^①不流血征服便使得千年繁華的江南社會結構與生產力沒有受到較大的重創，江南的經濟發展也沒有被中斷。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中斷言：“在中國早已開始了近代化時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斷了此一迅速進步的過程。”^②這是想當然的推測。書中用『馬可波羅遊記』記述的南宋滅亡以後繁榮的城市商業發展，恰恰無形中否定了他自己的推論，反證元代延續了南宋的“近代化”。

除了馬可波羅的域外人之眼，北方人關漢卿也在元曲中描述了其目睹的杭州繁華：“普天下錦繡鄉，寰海內風流地。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水秀山奇，一到處堪遊戲。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繡幕風簾，一哄地人煙湊集。”^③正是由於王朝鼎革沒有對江南經濟帶來較大的破壞，在硝煙散去的和平時期，元朝也跟隋唐北宋歷代王朝一樣，對江南經濟形成極度的依賴。

『元史·食貨志』如是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④今天的北京，當時的元大都，也由江南的支撐顯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

改朝換代並未中斷經濟發展的進程，反而更為開闊疆域的形成與多種貿易方式的導入，更為刺激江南經濟由內向轉為外向，商品經濟更加發達。包括元代江南持續的繁榮，對有元一代的經濟成就，也需要有一個整體的基本認識。舉一個例子，元末大量發行紙幣，但通貨膨脹率也僅達4%，並未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亂。^⑤這就從一個角度可以窺見經濟在元代並未停滯、倒退，而是有著持續的累積。南宋歷元，留給明清中國一個厚實的鋪墊。

南宋以後，資本的私有化、市場化範式得以維持，這種所謂的“史密斯式經濟增長”（Smithian Growth），讓人口總量不斷攀升。北宋的人口超過一億，南宋版圖儘管大幅縮小，也達到六千多萬。^⑥元朝後期的順帝初年，人口已達八千萬人。明代中後期已接近兩億，至清乾隆時期就已將近四億。除了新品種農作物導入的因素，追根溯源，都跟宋元變革所帶來的市場化經濟轉型關係密切。

有人認為元代“諸色戶計”的戶籍制度很有時代特色。其實，戶籍作為納稅單位，以職業設置，在南宋已經很普遍。在元代，據統計共有83種戶籍。不過，在宋代文獻中，至少也可以找到50餘種戶名。比如，有研究表明，在南宋就已經出現明顯與普通民籍相區別的擁有身份化世襲的灶戶。^⑦或許可以說，元朝的戶籍制度，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又部分地參考宋朝以及金朝的制度，擴大而形成的。^⑧無論制度上如何遺傳與變異，戶籍種類繁多的現實，無疑折射了社會發展的多元化。這種看上去是以公權力主導形成的專業分工和專業生產，我們從很多戶種來自宋代的歷史考察來看，實際上是順應了社會轉型的客觀變化。“諸色戶計”廣範圍的實施，形成了亞當·斯密所言“斯密動力”（Smithian Dynamics）。這種由專業分工增進勞動生產率所形成的動力機制，更為活躍了市場經濟，從而促進了商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⑨南宋中後期環太湖地區的城市化程度，有學者估測，城鎮人口已佔總人口的24%左右。^⑩入元以後，沒有遭受嚴重戰爭創

① 潘修人：「元朝統一中國過程中的殺掠問題辨析」『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3（1993）：14-19。

② [法]謝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劉東譯，第5頁。

③ [元]關漢卿：『關漢卿集』散曲「南呂一枝花 杭州景」，藍立萸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2018），第1708-1709頁。

④ [明]宋濂等：『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2364頁。

⑤ 王瑞來：『中國史略』第八章，第467頁。

⑥ 王瑞來：「縱橫辨“丁”“口”——宋代人口問題再考察」，『社會科學戰線』12（2022）：105-115。

⑦ 魏峰：「試論宋代的灶籍」，復旦大學「首屆中日青年學者宋遼西夏金元史研討會」論文集（2016）。

⑧ 關於金朝的戶籍種類，參見王曾瑜：「金代戶口分類制度和階級結構」，『歷史研究』6（1993）：46-62；劉浦江「金代戶籍制度芻論」，『民族研究』3（1995）：69-78。

⑨ [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通譯『國富論』）開篇便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接下來，亞當·斯密還展開闡述道：“有了分工，同數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作許多人的工作。”（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郭大力、王亞南譯，第5頁、第8頁。

⑩ 陳國燦：『中國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375頁。

傷的江南，無疑繼續了這種發展。

元朝的稅收南北有異。北方是穀物和科差，南方則沿襲南宋徵收夏秋兩稅。除了鹽業國家統制，食鹽年產量超過10億斤，稅金佔了全國稅收的一半之外，承自南宋發達的商業，商稅也成為國庫的主要收入源之一。元初北方土地的確荒廢較多，還有不少都被蒙古貴族搶奪改作了牧場，平民被略為驅口奴隸。但這種狀況自忽必烈即位後就逐漸得到了改變，人口與土地的掠奪被禁止。朝廷設置司農司，發佈『農桑輯要』，普及先進農業技術，將戶口和耕地的增加規定為官員升遷的條件，出臺了一系列農業振興政策。北方以軍隊屯田為主，南方則大力進行湖畔圍田與荒山開墾。比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由鎮升為縣後，出現了這樣的景象：“雖瀕海而廣原腴壤，盡境皆然。極目萬頃，莫有曠土。以十分計之，良田蓋居其九，故『元史』稱為瀕海重地。”^①整個元代的耕地面積已較前代有所增加，南方的糧食產量也比南宋時期增多。江南的中心區域蘇湖地區在南宋時期就已成爲糧食的主要產區，當時便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謠諺，^②到了元代，江浙行省歲入稅糧竟佔到全國的37%，^③可謂是名副其實的糧倉。全國由站戶管理多達1500以上的龐大站赤網路，不僅曾成爲元朝統治的有效保障，還連接著中央與蒙古的四大汗國，促進了歐亞大陸的經濟、文化交流。在站赤之外，元朝在舊有的京杭大運河之外，還開鑿了從山東到大都的三條運河。並且利用南宋的海圖開通了從南到北的近海航路，促進了物流的擴大與行商的往來。元人方回這樣寫道：“東南郡蘇杭第一，杭今設行省。南海百蠻之入貢者，南方之數百郡之求仕者，與夫工技貿易之趨北者，今日杭而明日蘇。天使之馳駟而來者，北方中原士大夫之仕于南者，東遼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今日蘇而明杭。”^④過去南宋的一百多年間，“北視淮甸，已為極邊”，^⑤元朝的統一，消除了人為的割據邊界，內陸運河與近海航運將南北中國連成一個整體，經濟與文化的“看不見之手”強固地粘結了唐以後實際上將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從此中國大陸再未出現政治分裂。這使宋元變革在統一的局勢下得以全域漸次無阻地鋪開。

承繼南宋的海外貿易，元代的規模遠超前代。南宋後期成書的『諸蕃志』記載有遍及歐亞非58個海外國家，^⑥元代前期成書的『大德南海志』記載了一百多個與廣州通商的國名和地名，^⑦元代後期成書的『島夷志略』則記載了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不少是作者汪大淵“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⑧從南宋到元代前後期，記載的資料折射出元代海外貿易的興盛與發展。日本木宮泰彥的『日中交通史』就歸納說：“元末六十年間，殆為日本商舶赴中國最盛之時期。”^⑨南宋人筆下當時面向世界貿易的寧波慶元港：“風颿海舶，夷商越賈，利原楛化，紛至還來。”^⑩這是南宋的景象，我們再來看元代，元人張翥慨歎慶元港的繁盛與稅入，在詩中寫道：“是邦控島夷，走集聚商舸。珠香雜犀象，稅入何其多。”^⑪透過同一個港口，我們看到了從南宋到元代的持續繁榮。

- ① [明] 郭經修、唐錦纂：『（弘治）上海志』卷一『疆域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37頁。按，明人引『元史』云松江為“瀕海重地”，見於『元史·沙全傳』，第3218頁。
- ② [宋] 徐元杰：『進講日記』，『宋代日記叢編收藏』（上海：上海書店，2013），顧宏義、李文整理標校，第1276頁。
- ③ [明] 宋濂等：『元史』卷九三『食貨志向』（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2360頁。
- ④ [元] 方回：『姑蘇驛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二二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358頁。
- ⑤ [元]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八『跋胡編修上京紀行詩後』（北京：中華書局，1997），陳高華、孟憲清點校，第470頁。
- ⑥ 楊博文：『諸蕃志校釋』前言（北京：中華書局，2000），第6頁。
- ⑦ [元] 陳大震纂修：『大德南海志』卷七『諸蕃國』（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第8431-8432頁。
- ⑧ [元] 汪大淵：『島夷志略』前言並後序（北京：中華書局，1981），蘇繼庠校釋，第2頁、第385頁。
- ⑨ [日] 木宮泰彥：『日中交通史』第十五章「日本與元人之貿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重印1931年商務印書館譯本，陳捷譯，第481頁。
- ⑩ [宋] 王象之編著：『輿地紀勝』卷一一『兩浙東路·慶元府』風俗形勝引李璜『修學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趙一生點校，第432頁。
- ⑪ [清] 顧嗣立編：『元詩選』戊集「送黃中玉之慶元市舶」（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1336頁。

當時的交通運輸網的自由利用，中間關稅的取消，加之武力保護，諸如此類的保護經商和優惠政策，不僅給元朝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還讓歷史上最早的世界交通路線與國際貿易體制，遠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便在歐亞大陸間形成了。宋元變革在元代的全面展開，無疑為後來明清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①

對於元朝來說，江南就是糧倉和錢口袋。元末張士誠、朱元璋、陳友諒等地方武裝蜂起，讓元朝失去了對江南的控制，從而以商業和流通為主的橫貫歐亞的經濟體系便走向崩潰。加之各種綜合因素，最終導致了元朝的滅亡。這一事實也彰顯著江南的重要性。

元明易代，江山鼎革，但江南並沒有消失，社會轉型一如既往，並且溢出江南，漫捲全域。杉山正明從世界史的視點指出：“從歐亞規模來看，蒙古經過吸收南宋的遺產，當時的江南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充滿富有的‘生產社會’，以陸海兩種方式向世界開放。”^②

（三）“罷科舉而用掾吏”：與吏治天下

由於元朝政府的決策層在開與不開的政策分歧中延宕，造成數十年間的科舉停廢。在這種偶然性因素的背後，其實是由於社會多元化與有效的吏職管理層的存在，削弱了科舉生產官僚的必要性。追溯這種必然性的因素與背景，正是發端於南宋。元朝長時期停廢科舉，以後雖然勉強開科取士，但有元一代的登第人數甚至不及宋代一榜之多，對政治並未產生多少影響，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經世大典』就講述了這樣的事實：“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姑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為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寢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於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取不及百人爾。”^③科舉之門半掩，薦舉之門洞開。仿佛東漢的舉孝廉，建構地方文化秩序的士人擁有著能動的話語權。

然而，科舉的長期停廢，畢竟堵塞了舊有的士人向上流動的主要通路。絕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謀求在地方的橫向發展。在多元選擇中，為吏大概是最大的選擇。在這種利用知識優勢務實之舉的背後，其實還隱含了過去通過科舉走向仕途之夢。這種選擇也與元朝政府從胥吏中選拔官員的方向一致。元朝政府重視胥吏的作用。清人就指出過，“元初罷科舉而用掾吏”。^④因而，胥吏養成的『吏學指南』之類的書籍在元代也應運而生。^⑤元代士人棄儒從吏，乃當時之潮流。元朝以吏為官，吸納了大量士人。

流向地方的士人，其中的多數並沒有可能成為強勢的鄉紳。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更多的沒有太大勢力的士人，便在沒有可能當官的情況下成為了所謂的胥吏。官為朝授，吏為官招，性質不同。在宋代出現的以吏為職業的“吏戶”^⑥，就反映了這種變化。並且，在宋朝一直就有由吏入官的制度與實踐。在元朝停廢科舉的時期，許多士人加入到了胥吏的隊伍之中。元人鐘嗣成的『錄鬼簿』就記載了這樣一位元士人的經歷：“鮑吉甫，名天佑。杭州人。初業儒，長事吏，簿書之役，非其志也。跬步之間，惟務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編撰，多使人感動詠歎。余嘗與之談論節要，至今得其良法。才高命薄，今猶古也，竟止昆山州吏而卒。”^⑦『元史·選舉志』也對元代科舉廢止後士人的流向做了概括性的描述：“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

① 以上所述參見王瑞來『中國史略』第8章，第471-477頁。

② [日]近藤一成主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288頁。

③ [元]趙世延等撰：『經世大典』卷五『治典·入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周少川等輯校本，第57頁。

④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四『官民准用』（北京：中華書局，1965），第728頁。

⑤ [元]徐元瑞：『吏學指南』（濟南：齊魯書社，2017）王瑞來、霞紹暉點校。

⑥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八一『上趙寺丞論秤提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1986），第1168冊，第854頁。[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四八『有宋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行狀』（北京：中華書局，2011），辛更儒『劉克莊集箋校』本，第6453頁。

⑦ [元]鐘嗣成：『錄鬼簿』卷下（北京：中華書局，2021），王綱校訂，第88頁。

執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①

北宋宰相文彥博對神宗說的一句“與士大夫治天下”，揭示了自北宋以來與君主共治的士大夫政治特徵。元代長期停廢科舉，士大夫生產的傳統來源供斷，由吏入官成為士大夫生產的新來源。元代大儒吳澄曾觀察到這樣的事實：“至元間，予嘗游京師，獲接中朝諸公卿，自貴戚世臣、軍功武將外，率皆以吏發身。蓋當時儒者進無它途，惟吏而已。”

在宋代儘管也有以吏入官的制度規定與實施，但以科舉出身為主途的官與從事具體庶務的吏等級地位天淵懸絕。吳澄也指出吏的地位“浸浸以賤，逮宋之季極矣”。然而到了元代，由吏入官成為主流，官與吏的界限就變得模糊。且不論出於何種考量，士人對吏抵觸的意識開始有了一定的轉變，至少對吏已經減弱了觀念上的歧視。面對以吏為官成為主流的現實，也出現了儒、吏合流的主張：“夫吏之與儒，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儒不通吏，則為腐儒；吏不通儒，則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後可以蒞政臨民。『漢書』稱‘儒術飾吏治’，正謂此也。今吟一篇詩，習半行字，即名為儒，何嘗造學業之深奧？檢舉式例，會計出入，即名為吏，何嘗知經國之大體？吏則指儒為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指吏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自儒，吏自吏，本出一途，析為二事，遂致人物之冗，莫甚於此時也。”^②元代大儒吳澄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也這樣講過：“曰官曰吏，靡有輕賤貴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後之官。官之與吏，情若兄弟。每以字呼，不以勢分相臨也。”^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元代一變與士大夫治天下為與吏治天下。元代另一個文人揭傒斯已經指出了這一事實：“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④

（四）“由儒入吏”：士人在政界內外活動的意義

在行政領域，元代的儒與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補共存。元人許謙就這樣寫道：“今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至渥也。有不得預於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于學，周制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為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斯世，可謂幸矣。”^⑤

南宋科舉登科後的改官難，升遷難，是造成士人流向多元化的重要因素。進入元代，科舉的長期停廢，儘管改變了入官路徑，但仕途路難行的狀況依然沒有改變，甚至更為艱難。元代儘管以吏為官，升遷改官問題也相當嚴峻，元代絕大部分的士人終其一生沈淪下層，升遷受到起官品級限制。比如八品官，大多在七品上下，且多是在地方平行遷調，輾轉於州縣。^⑥許多利用知識優勢的士人，儘管可以出任學官和儒吏，但也只能停滯於難以升遷的官僚底層。

求生的壓力，讓士人流向多元化、地方化的趨勢在元代更為加深，更為普遍。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包弼德先生對元代婺州的個案考察中略可窺見。他指出，婺州士人在宋代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跨州親屬關係，但在元代卻高度限縮於一州之內。^⑦就是說，士人的地方化儘管傾向始於南宋，到了元代才形成普遍趨勢。可以這樣講，南宋開始的士人流向多元化，在元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獲得了全面實現。

元朝設置的儒戶，不管與南宋末年的士籍有無關係，對士人身份的確定，客觀意義也非同小

① [明]宋濂：『元史』卷八一『選舉志』（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2018頁。

② [元]鄭介夫：『太平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五三六，第26頁。

③ [元]吳澄：『吳文正集』卷二四『贈何仲德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1986），第1197冊，第256頁。

④ [元]揭傒斯：『文安集』卷一一『善餘堂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1986），第1208冊，第248頁。

⑤ [元]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三『代人上書補儒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蔣金德點校，第989-990頁。

⑥ 參見洪麗珠：『元代縣級官府與官員』（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第74頁。

⑦ Peter K. Bol, *Localizing Learning: The Literati Enterprise in Wuzhou, 1100-16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2), p.189.

可。對士人的身份，從南宋習慣認同，到元朝的正式確定，不以職業相區別，不以擁有財富為標誌，而是把文化作為身份，讓無恆產的士也躋身於眾多的以職業劃分的戶種之中，成為其中的編戶齊民。從自貴到他貴的過程，在社會轉型的綜合力量推動之下得以完成。作為世襲的文化貴族，不憑藉祖上的血緣門第，在元代終於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蕭啟慶先生認為，比較社會的其他階層，元代儒戶，大致與僧、道、也里可溫等宗教戶計相當，擁免除雜泛差役特權，總體上權利大於義務。^①在我看來，儒戶與其他宗教戶計的重要區別在於，是社會中以文化為標誌的精神貴族群體。元廷也對儒者“貴其名而存之”。^②據蕭啟慶先生估計，江南的這個群體，達10萬戶之多。^③可以說明清強勢的鄉紳社會正是淵源於此。

失去舊有政治優勢的士人，根植於地方，更為注重宗族建設，順應朝廷的重視，牢牢守住儒業，來彰顯文化優越，以此光大門楣，立足於地域社會。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元代大儒吳澄寫下的幾篇族譜序文的表述中可以概見。在『青雲吳氏族譜序』中這樣寫道：“時運既更，凡舊族鮮不陵替，獨此族之人治儒業，有恆產，視昔未替。”^④在吳澄看來，“治儒業”是因，“有恆產”是果。在『宜黃曹氏族譜序』中，吳澄又如是說：“（宜黃曹氏）在宋季所以好宦族、儒族，而望於其邑者也。宋祚已訖，其子孫能保守家產、傳習儒業者尤有人。”^⑤在這裡，“保守家產”與“傳習儒業”也構成了因果關係。關於“傳習儒業”，吳澄在『金溪吳氏族譜序』中則有具體描述：“宋之季，以科名顯者相踵，而宋亡矣，詩書禮義之習逮今猶前日，其盛未替也。”^⑥從吳澄的講述中可以體味到，超越政治，超越族群，儒學是元代士人牢牢守護的精神根脈，以這樣的精神根脈支撐來建設家族。

宗族並不是封閉的，根植於特定的地域社會，參與地方事務。無論遼金舊地還是南宋轄地，江南塞北山川異域，社會發展程度或有不同，但只要是農耕地區，社會基層的組織形式千百年來，雖因時略異，但從名目到實質，多是沿襲傳承，變化緩慢。『金史·食貨志』就如是記載金朝統治區域的基層社會組織：“令從唐制，五家為隣、五隣為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戶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⑦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制度的來源是“從唐制”。源自中原王朝的基層組織制度又在金朝治下擴展到了女真的猛安謀克部族。元代的基層社會組織里正、主首、社長綜合承自前代。儘管里正、主首需要官府任命，但與宋代一樣也是從富戶中選任，屬於拿薪水的官吏序列之外，而里正、主首之下的社長則是由民眾選出。『元史·食貨志』載：“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⑧

基層組織的職役像是一個中間管道，除了承擔官府徵稅派役，還負責維持治安，勸農教化。既是官府伸延的行政末端，又是鄉里民眾的主宰。在聚族而居的鄉村，宗族的族長往往成為基層職役的承擔者，而宗族組織中的族長等同時又是地方上有勢力的鄉紳，幾個角色集於一身，主導地方大大小小的事務。^⑨日本的元史學者植松正通過考察認為：“處於元朝統治下的南中國，對於政府土地的支配實際上是不徹底的。一方面處於異民族的支配下，另一方面反而助長了地主階

① 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收入『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第1-58頁。

② 〔元〕趙世延等撰：『經世大典』卷五『治典·入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周少川等輯校本，第57頁。

③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727頁。

④ 〔元〕吳澄：『吳文正集』卷三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1986），第1197冊，第341頁。

⑤ 〔元〕吳澄：『吳文正集』卷三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1986），第1197冊，第345頁。

⑥ 〔元〕吳澄：『吳文正集』卷三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1986），第1197冊，第347頁。

⑦ 〔元〕脫脫等：『金史』卷四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031頁。

⑧ 〔明〕宋濂等：『元史』卷九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2354頁。

⑨ 關於元代的地方基層組織，參見陳高華、史為民：『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134-140頁。

層的成長。”^①植松正這裏所說的“地主”，正是在地域社會中有勢力的鄉紳。

陳雯怡博士如是概括包括蕭啟慶先生等學界的認識：“元代的士人階層雖然在異族統治下失去其在前宋的政治優勢，但基本延續下來，並維持其在社會、經濟上的領導地位。他們對時局的因應，反而成為士人社群在社會、文化等領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②這樣的狀態表明，宋元易代對根植于地方的士人階層並未產生改變地位的影響，反而士人主導的社會轉型依然朝著既有的方向繼續發展。

實現全域統一後的元代南北社會，發展遲速有很大不同，顯示出不平衡性。比如北方山西的士文化到了明中期才逐步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③不過，交互影響會讓社會逐漸向趨同方向發展則是無疑的。至少，在南宋便已走向地域的士人，在南方的地域社會依然保持著強勢。王錦萍在考察後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儘管受到有勢力的佛道寺觀的威脅，士人主導的社會機制在元代江南地區仍然保持著重要的地位。”^④不過，王錦萍認為，元代導致了華北社會的斷裂。她還觀察到，北方士人有不少選擇參與對地方社會具有強勢控制力的僧道教團，來維持生存與發揮作用。^⑤當然，個別地域和一定時期呈現的狀況是不是可以反映社會變化的整體趨勢，容或存疑。並且，在三教合一的趨勢之下，以儒學為根基的士人對其他宗教並不持有強烈的排斥傾向。比如王重陽創立的勢力很大的全真教，就將儒學的『孝經』佛家的『般若心經』和道家的『道德經』均奉為經典。從這樣的理解來看，士人參與僧道教團，也並無太多的心理抵抗。

回顧歷史，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釋道勢力也有一時上升的現象，但並沒有改變社會主流方向。再後視歷史，王錦萍以山西一地所述元代北方的狀況，從明清華北、中原的鄉紳強勢來看，無疑宋元變革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地域覆蓋。沿襲宋元的傳統，鄉紳階層在明清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

在元廷儒釋道均等對待的政策之下，延續三百年的宋代士大夫政治消亡，依然存在並不斷產出的士人，失去了獨尊的地位，學而優則仕的上升道路被基本堵塞。儒戶的設置，只能讓部分士人享有選拔充當學官或儒吏等待遇。而作為學官，教授的內容也與宋代以科舉應試為主的政治精英教育有了極大的不同。除了儒學經典之外，實用性的內容較多，如吏學教育、醫學教育、陰陽學教育以及蒙古字學教育等。不過，儒學依然是朝廷提倡與民間教育的重點所在。元代基層社會五十戶為一社，每社都設立一所學校。『通制條格』記載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規定：“今後每社設立學校壹所，擇通曉經書者為學師，於農隙時月，各令子弟入學。先讀『孝經』、小學，次及大學、『論』、『孟』、經、史，務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⑥無法擔任學官的士人，也有不少興辦私學，開館授徒。或是受聘於民間義塾、社學、書院，乃至到富戶的家塾教書。這種狀況使元代下層士人成為基層發蒙教育的主要承擔者。教育內容的寬泛，也讓元代教育的範圍擴大，教育對象的數量增加。^⑦這樣一來，自南宋以來走下行路線注重民眾教化的儒學更為深入到基層社會。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轉型，則普遍提升了民眾的文化素質。自南宋以來持續繁榮的印刷業，支撐著民間教育與平民文化的普及。

到了元代，前述南宋的童蒙讀物一直在廣泛流行。元代中後期成書的『通制條格』就記載：

① [日]植松正：「元朝統治下的江南地域社會」，[日]近藤一成主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85頁。

② 陳雯怡：『“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2009），第43-114頁。

③ 王錦萍：『蒙古征服之後：13-17世紀華北地方社會秩序的變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陸琪、劉雲軍譯，第276頁。

④ 王錦萍：『蒙古征服之後：13-17世紀華北地方社會秩序的變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陸琪、劉雲軍譯，第276頁。

⑤ 王錦萍：『蒙古征服之後：13-17世紀華北地方社會秩序的變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陸琪、劉雲軍譯，第276頁。

⑥ 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卷一六『田令·農桑』（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461頁。

⑦ 參見申萬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第595-605頁。

“村莊各社請教冬學，多係粗識文字之人，往往讀『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①^②正如在南宋開啓的宋元變革承繼了唐宋變革的北宋積澱，進入明代，宋元變革的社會轉型也被全面繼承，並在各個領域不斷深入發展。比如明代的社學就是建立在里社基層組織基礎上的庶民教育機構。^③上述元代一社一校的基層教育事業，在明代得以持續增長。有學者根據明初的人口戶數與設學規定，估計全國約有社學145935所，又以一校設一教讀計，全國社學的教師就達十四五萬五千多人。^④明末游歷中國葡萄牙傳教士就感嘆中國民間的普通教師數量之多。^⑤這一事實，既表明了宋元變革在此後時代的縱深發展，也顯示了在鄉村社會士人的活躍。

（五）“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士人的華夷認同

長時期的多民族衝突與融合，也讓中國人具有了強韌的心理適性，讓中國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宋元變革社會轉型強化了對政治的疏離，元代的大一統又淡漠了華夷意識。

元代的士人擁有著大大小小的交遊圈子，常常舉行詩詞雅集。較為有名的是元末顧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前後有八十多位在江南的詩人、詞人、畫家、書法家、散曲家、方士以及僧人參與過雅集，結集『玉山草堂雅集』，收錄有多達三千多首詩篇，成為元人編選的數量最多的元詩總集。觀察這些詩篇的內容，以寫景抒情、詠史言志和交遊唱和為多，不僅極少涉及時政，還有不少是與元廷各級官員的酬唱。^⑥留下記錄的，還有規模較小的，為唐代名臣魏徵的後裔魏壽延主持的上虞雅集，留下收錄近百首詩篇的『敦交集』，^⑦內容也與『玉山草堂雅集』一樣，華夷意識乃至政治意識都比較淡薄。作為個案，我還考察過元代著名畫家黃公望留下的詩篇，也是同樣的狀態。^⑧

思索元代士人政治意識淡薄的原因，無疑跟南宋以來形成流向多元化的士人與政治疏離有著一定的淵源關係。元代士人華夷意識的淡薄，既有長期生活在遼金蒙治下北方士人的習以為常，也有南方士人對元朝“以夏變夷”政策的接受。^⑨北方的長期漢化進程，南方的漢法施行，兼之對政治的疏離，這些綜合的現實因素都讓元代士人的華夷意識逐漸走向淡薄。進一步深究，在非漢族統治的時代，儒學的教養又賦予了士人在治國平天下之外的新的使命，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用夏變夷”。^⑩士人明確意識或潛意識中的這種文化使命，又與元廷的政策在客觀上形成合流。

隋唐時期發端的山水畫在宋元明時期發展到了極盛。山水畫在這一時期的盛行，並不僅僅是士大夫、士人超脫出世寄情山水的老莊思想的影響所致。據金觀濤先生研究，山水畫的盛行，與宋明理學同步發展，是宋明理學的視覺形態。他的學生從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找到了程朱理學的“進退辭受”和“冥想天理”，認為這種道德修身的觀念正是畫山水畫和觀山水畫的意義所在。金先生進一步闡釋說，在宋明理學之前，士大夫的價值人生只有“治國平天下”和退隱山林宴飲消日，而程朱理學則開啟了第三條道路。即朱熹在『近思錄』中概括為“出處”的進退辭受之理。這是說，儒者即使不入仕，也不必退隱山林，遁入老莊或空門，仍可以堅持忠孝節義，在民間教化天下。^⑪金先生的這一闡釋，正與南宋道學致力於向下以道化俗的方向相契合。從山水

① 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250頁。

② 方齡貴：『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250頁。

③ [日]五十嵐正一：『中國近世教育史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第3-66頁。

④ 劉曉東：『明代的塾師與基層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61頁。

⑤ [葡]曾德昭：『大中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46頁。

⑥ 楊謙：『顧瑛與玉山雅集』，載『草堂雅集』卷首（北京：中華書局，2008），第1-16頁。

⑦ 施賢明：『〈敦交集〉的編纂及其書寫內容述論』，『中外論壇』4（2021）：41-56。

⑧ 王瑞來：『寫意黃公望——由宋入元：一個人折射的大時代』，『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4（2011）：57-68。

⑨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世祖紀』這樣評價忽必烈：“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377頁。

⑩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一四『滕文公章句上』：“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北京：中華書局，1987）沈文倬點校，第393頁。

⑪ 金觀濤：『宋明理學和山水畫』，載金觀濤、毛建波主編『中國思想與繪畫：教學和研究集』（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

畫盛行的視點，展示了宋元變革社會轉型。而我所研究的元代山水畫巨匠黃公望的生平經歷，則是絕好的個案闡釋。

有名的南宋遺民梁棟，寫下不少詩篇懷舊，甚至還曾因一首題壁詩被告有“有思宋之心”而抓進牢獄。^①不過，從他的文章使用元朝年號，講述“皇元平定河南，混一區宇，民物繁庶”，^②並祈願“國祚鴻休”來看，^③顯然他後來已經認同了元朝的正統。另一個曾經對元朝統治極為抵觸的南宋遺民謝枋得，通過親身體驗，居然幾度對不同的元臣講出了同樣的話：“大元制世，民物一新”。^④形成“民物一新”的前提是元朝的統治。前者是因，後者是果。這句話非常清楚地訴說了謝枋得的感受，這就是社會由宋入元帶來的種種新氣象。這些新氣象不僅包含了新的大一統時代帶來的政經以及文化的新因素，也包含了江南區域生發的社會轉型範圍廣泛的擴展。

承繼南宋以來印刷業繁榮這樣的新媒體革命，元代書坊蜂起，迎合民衆的故國之思，編纂出版了『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宋季三朝政要』『錢塘遺事』『宋史全文』等大量宋史方面的書籍。^⑤書坊公然編纂出版前朝歷史的書籍，毫無忌諱，進一步聯想到元雜劇中大量的如『趙氏孤兒』等藉古諷今之作，總以為是元朝的政治寬鬆是基於蒙古人的粗放統治，並且對漢語相對隔膜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後來看到前述梁棟詩獄，元朝禮部居然有這樣的判擬文字：“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⑥由此可以看到，元朝的文網寬鬆甚至超過了士大夫主宰的宋朝。南北兩宋不乏文字獄的發生。出自元廷的判詞，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橫跨歐亞大陸大帝國的氣度。這一事實無疑可以成為“大元制世，民物一新”的一個注腳。存在時期遠不及漢唐兩宋的元代，卻有著空前的大一統，延續了金與宋的社會的發展。錢穆考察明初諸儒為宋濂文集作序，就觀察到“誇元之文統”的意涵。^⑦

歷史是不中斷的流逝，王朝只是各個流段現成的標記符號，社會的發展，文化的演進，皆如積薪，隨時代而增幅。“元之文統”來自哪裡？我們看一個例子。清人顧嗣立編的『元詩選』收錄了元代14位元女詩人的作品。這14位女詩人都是江南出身。^⑧正是發達的江南文化奠定了“元之文統”。“元之文統”講的就是文化承繼前代在元代的發展脈絡。

由於上行路綫並不順暢，無法學而優則仕，進入元代，南宋以來士人流向多元化的勢頭一如既往。除了為吏的流向，跟南宋一樣，遁入空門的士人也有一定的數量。這些遁入空門的士人有一些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後來成為釋道領域有影響的人物。如俗姓陳的笑隱大訖，在出家前就曾進入鄉校，接受教育，出家後“益研教典，旁及儒家道流百家之說”，^⑨最後出任元代最高官寺大龍翔集慶寺開山住持，官拜太中大夫，三品文階，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深受元廷禮遇，“日召對奎章閣，賜坐，說佛心要，深契上旨”。^⑩笑隱大訖以其儒釋道教養學識不僅影響教化了元朝君主，還融入當時主流的漢人文化圈，成為其中的一員。虞集寫道：“學士大夫，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康莊公文原，四明袁文清公桷，房山高公彥敬，東陽胡長孺汲仲，錢唐仇遠仁近，延祐進士莆城楊載仲弘，金華黃潛晉卿，及今翰林待制京兆杜本伯原，前後負

① [元]孔克齋撰，高林廣、曹慧民、王一格校箋：『至正直記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第192-195頁。

② [元]梁棟：「重修考叔廟碑記」，『全元文』卷三七三，第88頁。

③ [元]梁棟：「三皇廟碑」，『全元文』卷三七三，第87頁。

④ [宋]謝枋得：『疊山集』卷四『上程雪樓禦史書』、同卷『與參政魏容齋書』，『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⑤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宋]劉時舉撰、王瑞來點校，中華書局，2014），『宋季三朝政要』（[元]佚名撰、王瑞來箋證，中華書局，2010），『錢塘遺事』（[元]劉一清撰、王瑞來校箋考原，中華書局，2016），『宋史全文』（[元]佚名撰、汪聖鐸點校，中華書局，2016）。

⑥ [元]孔克齋撰，高林廣、曹慧民、王一格校箋：『至正直記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第192-195頁。

⑦ 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收錄於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第77頁。

⑧ 參見熊海英：「成為“詩人”，成為“女詩人”——以鄭允端『肅閑集』的編、刊、評為中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0（2023）：1-13。

⑨ 黃潛：『黃潛集』卷二八『龍翔集慶寺笑隱禪師塔銘』，王頌點校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第1031頁。

⑩ 虞集：『元廣智全悟大禪師太中大夫住大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訖公行道記』，『全元文』卷八五八，第41頁。

時盛名，與師為文學之友者也。”^①這裡提及趙孟頫、鄧文原、袁桷、高彥敬、胡長孺、仇遠、楊載、黃潛、杜本都是擁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文壇名流。他們的交流，造就了“東南文物之盛”。

『鬱氏書畫題跋記』中「張貞居雜詩冊」就這樣寫道：“余觀在昔右文之際，文章翰墨，蓋莫盛於東南矣。不惟列侍從居館閣者，皆彬彬文學之徒，至於方外名流，亦或負其清才絕藝，擅名一時之盛。故釋之徒，有笑隱忻上人，道家者流，有貞居張外史，皆以詩文篇翰照映乎山林，而與虞、趙、歐、黃諸君子交接於後先，迭響乎中外，於是東南文物之盛，殆前古所未聞。”^②不僅如此，笑隱大訢的『蒲室集』在元世刊刻不久，便傳入日本，他的充滿儒學典故的士大夫化“蒲室疏”，被日本五山僧人奉為圭臬，實現了從“宋朝文法”到“大元法度”的轉化。^③

終結魏晉南北朝分裂狀態，再度實現統一的隋唐，處處顯現出南朝化傾向。同樣，乘元統一之勢，江南文化也席捲全域，形成了新的中國。降至明清，江南便成為最具中國元素之地。當然，元代以及元代以後的中國社會，並非江南一色，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充分融合了北方因素。正如陳寅恪先生形容隋唐文化那樣，“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到了中華傳統身軀之內，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④學界在研究隋唐史時提示的“北朝出口”，在研究元代以及元代以後的中國社會，也值得認真借鑒。閻步克指出：“北方少數民族的部族制度與華夏制度激烈碰撞，最終在北方地區激發出了新的變遷動力和演進的契機，體現在交替的胡化與漢化孕育出了強勁的官僚體制化運動，扭轉了魏晉以來帝國的頹勢，構成了中國走出門閥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國的歷史出口。”^⑤歷史的發展呈相似性。元代以後的中國，儘管江南呈現出主色調，其實是融合了北方因素的綜合色。並且，元朝儘管終結宋金南北分裂的局面，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但南北長期分裂造成的諸多差異，是全域統一後經歷了長時期的磨合，一點一點逐漸融合的。融合的重要推手，便是由南自北宋元變革的大潮。

結語

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重心合一造成的歷史時空之下，變革在各個領域深層次發生。這其中，作為社會精英士人的種種建構，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為社會轉型在元代全面鋪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原本在南宋疆域內走平民文化路線的道學，作為思想領域內引導宋元變革的精神推手，在元代廣闊的疆域內獲得了更為廣泛的普及，不僅規定了此後明清的思想方向，還成為引領漢字文化圈的主流意識形態。

宋元鼎革，主要是政治層面的變局。蒙元基本不流血征服，不僅在客觀上保全了江南的經濟，也讓江南的文化得以沿著平民化方向繼續發展。考古學者就通過考古發掘對元代江南墓葬形成總體印象，即“江南地區的元墓基本上是南宋後期墓葬風格的延續”，並且進一步觀察到這樣的事實：“墓主人的身份從高級品官、一般官吏到普通的鄉紳，從葬制上看不出明顯區別。”^⑥這一事實，正是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反映了江南文化並沒有因為江山鼎革而發生重大的改變。

南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合一的局面，被元朝統一改變，政治重心回歸北方，再現二元化狀態。江南作為經濟、文化的重心，在南宋特殊的政治格局之下達到了新的高峰。在杉山正明看來，“南宋的成立和前後的華北人口的向南方移動為開端，真正意義上的江南的開發和漢化開始深化，江南各地域的人口、社會、經濟、文化的比重增大。這個南北逆轉現象被元代直接繼承下來（嚴格地說到了元代才真正開始展開），與明代的狀況直接相連。這可以說是和現在有關的中

① 虞集：『元廣智全悟大禪師太中大夫住大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訢公行道記』，『全元文』卷八五八，第40頁。

② 明鬱逢慶纂輯：『鬱氏書畫題跋記』，趙陽陽點校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第512頁。

③ 參見王汝娟「從“宋朝文法”到“大元法度”：蒲室疏的異域傳播與受容」，『中華文史論叢』，1（2024）：339-364。

④ 陳寅恪：「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344頁。

⑤ 閻步克：袁行霈主編『中華文明史』第二卷第二章「官僚政治的確立與演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80頁。

⑥ 秦大樹：『宋元明考古』八「元墓的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第239-240頁。

國史上的大現象”。^①杉山正明的這段話強調了江南在元代乃至與此後歷史相聯繫的重要意義。

從長久來看，以經濟支撐的文化是最終壓倒政治的存在。南宋士人流向多元化，對政治保持了距離，顯示出疏離，將儒學思想賦予的政治理想從宏大的治國平天下，轉向修身齊家，進而以道化俗，以各種形式從事民眾教化和文化建構，引領塑造了強勢地域社會。進入元代，江南不再擁有南宋時代的政治地位，但依然擁有持續發展的經濟和士人主導的穩定的地域社會，文化也因以具有傳承創造的動力和向全國彌散融合的能量。道學北上，成為重要的文化粘合劑，在多元一體的元代社會有著深入的滲透。

以道學為主要內容的儒學，成為元代士人超越政治牢牢守護的精神根脈。有儒學經典的指引，有遼金漢化的傳統參照，疏離政治的元代士人又多了一項“用夏化夷”的文化使命。承續元代的二元化勢態，明清的江南遠離政治重心而長足發展，成為最具中國元素之地。關於這一點，從一個例證可以窺見。從元代開始的300年間，歐洲繪製的中國地圖，杭州一直被標注為最重要的城市，成為中國的標誌。^②這個例證顯示了二元分離狀態下文化的力量。

沒有元代，何來明清？元代實在是被學界低估意義的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前述的陳雯怡博士以婺州為例還指出：“如何解釋這個地方士人群體的文化及影響，便成為宋代以降歷史的重要議題，也是銜接明清鄉紳、地域社會研究的關鍵，而元代正是其間重要的一環。”^③這是以個案對元代之於中國歷史進程重要性的實證。可以這樣講，南宋迄元的變革，直接造就了明清以來的鄉紳社會。元朝的基層組織社制，就被明朝繼承下來，由里社制演化為里甲制。^④主持鄉村社會的依然是當地有勢力的鄉紳。

明清兩朝的政治形態與南宋和元朝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央集權獲得了極大的恢復和發展，不過強勢的地方鄉紳社會業已定型，國家與地域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並行發展。擁有政治人脈、經濟財富和文化優勢的鄉紳，成為迄止於近代的地域社會的主導。脫離元代這一重要環節，便難以解釋明清鄉紳社會的歷史淵源，從而無法解釋中國社會如何走入近代，走到今天的。

從世界史的視野觀察，元代承繼南宋以來的社會轉型，與歐洲、西亞、南亞的發展進程一致，幾乎同時進入近世社會。日本的佐竹靖彥簡潔地歸納世界史上近世社會的時代變化，一是從農村時代轉向城市時代，二是從宗教時代轉向知識時代。^⑤我們觀察從南宋至元的社會，正是具有這樣的變化特徵。關於轉向城市時代，前述南宋中後期環太湖地區城鎮人口已佔總人口的24%左右就是明證。關於知識時代，從北宋的理學興起，儒釋道趨向三教合一，^⑥到南宋道學大盛，元代道學成為官學，格物致知，尋天理，究人心，平民文化普及，這一切都是知識時代的表徵。追尋帶來這樣變化的主要因素，正是在時代的因緣際會之下士人引領的宋元變革。

在強大的商品經濟物質基礎之上，士人對基層社會的種種精神建構，形成了超越王朝的延續。文化不僅存於廟堂，更寓於民間。從此，雖會亡國，但不會亡天下。經過南宋至元的轉型動盪，走入明清，社會再次變得層次分明，從鄉紳階層到地方社會，都基本定型，中國邁開走向近代的步伐。

[責任編輯：黃奇琦]

① [日]近藤一成主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288頁。

② 黃時鑒：「馬可波羅遊記與西方古地圖上的杭州」，收入李治安·宋濤主編『馬可波羅遊歷過的城市』（杭州：杭州出版社，2012），第1-19頁。

③ 陳雯怡：「“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2009）：43-114。

④ [日]濱島敦俊：「明代江南の優免と竿牘」、山本英史編『演習：中国近世の法と社会』（東京：東洋文庫，2024），第122頁。

⑤ [日]近藤一成主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總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4頁。

⑥ 王瑞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結構與社會轉型」，『國際儒學』1（2023）：122-132。